

#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

许利平

**摘要:**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围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国内学界对其思想渊源、内涵、意义以及路径等进行了积极探讨,但存在着对其面临的难题分析不足以及过于关注物资层面路径等问题。基于既往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发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着双重深层次的现实难题,即意识薄弱和紧密度欠缺的问题。二者分别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认同困境、结构性矛盾相关。一方面,身份认同差异、价值认同多元和文化认同困境造就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结构的挤压、经济竞争结构的冲击和话语权结构的扭曲促使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不够紧密。破解上述难题,需要解决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建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统筹机制,多渠道深化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推进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权,发挥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的软联通和润滑剂作用。

**关键词:**周边命运共同体; 人文交流; 中国周边战略; 国际话语权;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许利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DOI:10.13613/j.cnki.qhdz.003167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展开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研究议程涉及对周边命运共同体内涵的阐释,对其学理和政策意义、实践基础、推进现状、现实挑战及可行性路径等。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认识到随着中国对外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周边战略利益也在不断延展。同时,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必须始终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进程相契合,其战略内涵必须不断得到扩充、实施路径不断调整。

鉴于此,本文基于对既往研究的梳理并结合对相关理论的把握,力图厘清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几个关键问题的认知:第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如何界定“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学理性关联?明确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对于正本清源、以整体视角捋顺、整合进而顺利推进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状及挑战。以科学化、理论化的视角审慎客观地认知并评估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中的实践路径及现实挑战,有助于未来精准施策、以更加集约和有效的方式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同广大周边国家间的观念共识,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战略指引作用,成为塑造利我周边战略环境的软性支撑力量。第三,全面评估并重新认识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往研究及其不足

2013年10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

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sup>①</sup>此后,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场合频繁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无疑,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鲜明旗帜以及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抓手。周边地区是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地区,命运共同体倡议始于中国周边地区。因此,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学界对于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涵盖了对其核心概念——“命运共同体”的溯源与内涵剖析,以及对构建意义、基础、挑战以及路径的探究,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溯源。此类研究认为,无论是周边命运共同体,亦或是中国在外交场合提出的其他命运共同体,它们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一脉相承,拥有相同的思想和理论渊源。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渊源,学界认为有三点。其一,是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于“协和万邦”“和合共生”“义利合一”“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sup>②</sup>另有学者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儒家大同思想中“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念。<sup>③</sup>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sup>④</sup>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在现实条件下的替代方案,是“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转化的过渡阶段。<sup>⑤</sup>其三,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底蕴。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公正、自由”的思想源于人类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和平、发展”的理念来自于人类共同的社会价值观。<sup>⑥</sup>

第二,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界定。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学者们通常是从现实的维度来阐释。学界认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应当由周边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周边价值共同体和周边文化共同体共同构成。学界分别对上述周边子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剖析。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共同体,需要遵循联动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以及共同发展的发展观。<sup>⑦</sup>关于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内涵,有学者指出,中国周边主要是亚洲国家,因此,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内涵与亚洲安全观的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以及可持续安全。<sup>⑧</sup>关于周边利益共同体的内涵,有学者认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缩影,利益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愿意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它强调各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不得损害他国利益,以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共同发展、利益共享、可持续发展是其基本内涵。<sup>⑨</sup>关于周边文化共同体的内涵,有学者指出,天下为公的责任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和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是其主要构成。<sup>⑩</sup>还有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阐释了周边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并认为人的自由流动和发展要素分布的均等化是周边文化共同体的核心要义。<sup>⑪</sup>

第三,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意义的探讨。根据学界的主流观点,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7页。

② 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11—14页。

③ 孙聚友:《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东岳论丛》2016年第11期,第65页。

④ 张雷声:《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第31页。

⑤ 张三元:《开放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61页。

⑥ 林伯海、杨伟宾:《习近平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初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第145页。

⑦ 许利平等:《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路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5—57页。

⑧ 王玉冲、郑坤芳:《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44—51页。

⑨ 王玉冲、郑坤芳:《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第112—116页。

⑩ 石源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世界知识》2015年第1期,第18页。

⑪ 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41页。

体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周边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形而上学思维,打破了“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等论断,从理论上为通向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最高理想、兑现“为周边各国人民谋大同”的承诺提供了中国方案。<sup>①</sup> 还有学者表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出现、国际法对其正当性追问的回应以及国际法的等级化体系化发展趋势。<sup>②</sup>

在经济领域,学者认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将有助于实现地区国家的协同发展,实现群体性崛起。<sup>③</sup> 有学者补充道,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国与周边国家反恐协作、禁毒合作、环境治理以及应对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sup>④</sup> 还有学者认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的坚实基础与保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周边的生动体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可以很好地在中国周边凝聚共识、践行中国正确的“义利观”。<sup>⑤</sup> 还有学者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剖析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表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将有利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实现中国的“能源革命”。<sup>⑥</sup> 另有学者表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与“新疆域”的治理需求高度契合,有利于解决极地、深海、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中的主要矛盾。<sup>⑦</sup>

第四,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基础的探索。学界从多方的视角出发,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有基础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有基础,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步伐,经济和外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国际地位与日俱增。日益强大的中国为地区和平、国家间关系的和谐及人民的幸福安宁将提供强大的保障,增强了周边国家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向心力。同时,中国与周边多数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sup>⑧</sup> 从地区的视角来看,有学者表示,亚洲国家之间较高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以及亚洲各国推动命运共同体构建较高政治意愿都夯实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sup>⑨</sup> 另有学者补充道,亚洲国家的群体性以及亚洲国家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不断加深的区域认同感都成为了打造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sup>⑩</sup>

第五,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挑战的研究。根据学界的观点,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挑战来源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正如有学者概括地指出,地区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机制竞争、观念竞争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sup>⑪</sup>

在政治领域,学界几乎都认为美国是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最大的威胁。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特点,美国不希望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会想方设法破坏命运共同体的打造。<sup>⑫</sup> 美国的战略手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制造中国周边分裂;二是与中国“脱钩”;三是污名化中国。<sup>⑬</sup> 在疫情之下,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还在进一步加强。除了美国因素之外,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对冲同样威胁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学者认为,构建周边

① 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26页。

② 张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社会基础理论的当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43页。

③ 赵立新、沈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国学》2018年第65辑,第414页。

④ 王玉冲、郑坤芳:《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第9—15页。

⑤ 刘亮亮:《积极打造“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经济研究导刊》2019年第11期,第14页。

⑥ 杨泽伟:《中国与周边能源共同体的构建:法律基础与实现路径》,《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年第1期,第29页。

⑦ 杨剑、郑英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疆域的国际治理》,《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第1页。

⑧ 陈邦瑜、韦红:《周边外交视角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4期,第42页。

⑨ 王俊生:《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概念、内涵、路径》,《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6期,第55—56页。

⑩ 屈彩云:《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价值认同》,《前沿》2015年第10期,第7页。

⑪ 凌胜利:《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挑战与对策》,《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5期,第33页。

⑫ 王俊生:《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概念、内涵、路径》。

⑬ 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2021年第7期,第53—54页。

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中国“一厢情愿”和“动力转化”的困境。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但在实操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地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而有些国家则采取“选择性”参与。周边大部分国家并没有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化到自身的思想与意识当中。<sup>①</sup> 还有学者表示,周边各国战略利益的差异同样制约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针对发展战略,各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sup>②</sup>

在安全领域,学者们认为中国周边悬而未决的传统安全问题和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都威胁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传统安全问题方面,有学者指出,受国家利益的驱使,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频繁在中国周边滋事,严重影响到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sup>③</sup> 另有学者指出,中国周边长期存有的领土争端和海权争议同样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带来不良影响。<sup>④</sup> 在经济领域,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硬件”和“软件”设施的欠佳。在“硬件”设施方面,有学者认为,周边国家滞后的基础设施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打造最大的制约因素。<sup>⑤</sup> 在“软件”设施方面,有学者指出,周边地区“制度过剩”问题制约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针对周边地区的众多区域公共问题,周边各方提出了大量区域合作方案,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峰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这极大地提升了外交成本,令各国应接不暇,难以找到重点。<sup>⑥</sup> 此外,还有学者补充道,周边地区金融合作机制的欠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sup>⑦</sup>

在文化领域,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存异困境”。有学者认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目标是寻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化,共同化以共同性为前提。如何在求同和存异之间寻求平衡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在理论层面上也没有清晰的界定。<sup>⑧</sup>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与周边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周边很多国家存在的强烈排他性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sup>⑨</sup> 另有学者指出,媒体舆论的误读对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有着相当的负面影响。而这种误读与共同体理念的抽象化、单向化传播有关。<sup>⑩</sup>

第六,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路径的探索。基于学界的观点,想要成功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周边国家需要在政治、安全、文化等多方面做出努力。当前,学者们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路径的探索大多都处于宏观层面上。有学者指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打牢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这三大支柱。<sup>⑪</sup> 另有学者更为具体地指出,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一体化建设、发展海上伙伴关系、加强防务合作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sup>⑫</sup> 另有学者提出,“新亚洲安全观”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保障。中国需要承担大国责任,为周边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sup>⑬</sup> 同时还需要塑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情感纽带,搭建与地区国家长效的文明互鉴机制。<sup>⑭</sup> 还有学者强

① 王亚宁:《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困境与出路》,《公共外交季刊》2019年第2期,第59页。

② 王玉冲、郑坤芳:《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第135页。

③ 王玉冲、郑坤芳:《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第56页。

④ 刘亮亮:《积极打造“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⑤ 王玉冲、郑坤芳:《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第134—135页。

⑥ 赵可金:《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对周边外交的思考》,《世界知识》2020年第3期,第18页。

⑦ 胡伟主编:《“一带一路”打造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5—148页。

⑧ 王亚宁:《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⑨ 许利平等:《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路径》,第155—156页。

⑩ 周晓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第135页。

⑪ 刘振民:《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营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页。

⑫ 陈邦瑜、韦红:《周边外交视角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⑬ 赵洋:《亚洲安全观视域下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3期,第105页。

⑭ 陈雨萌、韩海涛:《习近平新时代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探究》,《观察与思考》2021年第5期,第49页。

调边疆治理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地位。<sup>①</sup>

此外,也有学者从更为微观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利益—责任—规范”三位一体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认为,“利益”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立前的保障,“责任”和“规范”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立后维持其更好地运作和发展的保障。周边国家作为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接受者,在享受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利益”时,应承担作为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同时还要遵守命运共同体成员应共同遵守的“规范”。“利益—责任—规范”三者互为条件,任何国家都不能只索取“利益”而不承担“责任”、不遵守“规范”。<sup>②</sup>

总体来看,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溯,我们对于学界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及其相关概念的研究现状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内涵、困境、意义以及路径等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讨。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政治说教层面,缺乏理论的支撑。这便使得他们研究过于庞杂,匮乏系统性和学理性。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们注重运用概念分析法、文本解读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倘若可以加入数据分析法、访谈法等定量研究法,将使得研究成果更具精确性和说服力。从研究视角看,既往研究由于忽略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持续动态演化的特征,往往倾向于以静态视角对其进行剖析和价值评估,因而无法对周边命运共同体之于中国对外战略整体框架中的定位予以准确把握,未能清晰地认知其推进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潜在挑战,亦无法提出有效的推进路径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周边战略环境变化。

## 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挑战:认同困境与结构性矛盾

需要认识到,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问题。而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的问题往往与认同相关。所谓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在个体层面,认同是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的理性确认,是个体社会行为的持久动力;在社会层面,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与分享”。<sup>③</sup>与命运共同意识相关,认同涉及身份认同、价值认同与文化认同三个层面。

### (一)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困境

第一,身份认同差异。身份认同主要包括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认同两种,是国家自我定位与他者认知互动的客观反映与主观建构的过程,<sup>④</sup>对于周边国家来说,身份认同差异在于它们对“周边”理解不同。

首先,每一个周边国家都有自己的“周边”概念。从概念基本涵义出发,任何国家的“周边”概念都是建立在以“我”为核心的角度,形成不同范围的“周边”。<sup>⑤</sup>这些差异性的“周边”基于每个周边国家的自我定位。

其次,中国提出的“周边”,往往被理解成秩序的涵义,被西方解释为中国试图恢复往日的朝贡体系,建立中国所谓的霸权秩序。

其实,朝贡体系往往被一些西方学术界解释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礼治秩序。虽然中国历史上存在

① 孙宏年:《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边疆治理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2期,第9页。

② 卢光盛、别梦婕:《“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周边外交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以澜湄合作》,《国际展望》2018年第10期,第20—25页。

③ 周德刚:《经济交往中文化认同理论探微》,《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44页。

④ 肖晞、宋国新:《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8页。

⑤ 李博一、杨文萱:《区域秩序向度的中国周边外交》,《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第72页。

一定程度上的朝贡体系,但更多是“薄来厚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是建立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胁迫”意涵。实际上,“朝贡概念不仅是中国帝王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厢情愿,同时也是东亚整个国际社会所认同的,形成了普遍认识的共同观念,或者说形成一种国际惯例”。<sup>①</sup> 这种惯例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与当今国际秩序没有必然联系。

再次,中国提出的“周边”,为邻国的涵义,没有任何中心论的意涵或者恢复所谓朝贡体系的目的。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高度重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同时使中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sup>②</sup>

第二,价值认同多元造成的差异。价值认同,是人们对某类价值观念的认可,并形成产生相应行为的过程。价值认同是情感认同的基本内容,而情感认同又是实现价值认同的关键,二者常常合二为一,没有情感认同,就没有真正的价值认同。换言之,价值认同始于情感认同,情感认同是价值认同的重要基础和来源。这就需要双方加强沟通、交流,培养双方民众的感情,增强彼此的好感度。

价值观认同是一个由外到内、由认知经由情感再到意志、由观念到行为的连续推进过程。从心理发展过程来看,价值观认同不仅要认同什么样的价值观、为什么要认同、究竟如何认同等问题有基本的理性认知,更需要价值主体在价值活动中拥有丰富的个体和群体情感体验。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制度存在一定差异,各国对待区域共同价值认同存在温差。在“四小龙”起飞阶段,区域内国家推动亚洲价值观的认同。对于什么是亚洲价值观,周边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第三,文化认同困境。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与价值取向。由于人类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因而文化认同也因文化的不同而各异,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也因此而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文化认同的涵盖随着人的文化群体的形成,整合及人类文化的交融而扩大。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类文化发展相伴随的动态概念,是人类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主位因素。<sup>③</sup>

周边国家文化千差万别。在这一区域,既有儒家文化、印度教文化,也有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这些文化既有差异,同时又具有共性。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中华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四大文化体系,同时又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这些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甚至相互碰撞,有时面临文化认同困境。在东北亚地区,各国大体存在相对单一的文化体系,对他者文化的认同存在不同程度的温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化本我主义”倾向。以印度次大陆为中心的南亚地区,素有“人种博物馆”和“语言博物馆”之称,这里不仅孕育着上古的印度文明、吠陀文明,还诞生了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和锡克教,它们之间相互交融与碰撞。

## (二)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时强调,“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sup>④</sup> 2021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时指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sup>⑤</sup> 2022年1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同中亚五

① 万明:《重新思考朝贡体系》,见周方银、高程主编:《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

② 林勇新、贺先青:《“印太”地缘政治建构及其对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影响》,《南海学刊》2020年第3期,第101页。

③ 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

④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1页。

⑤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18日,第1版。

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时强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sup>①</sup>无论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还是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三者都属于周边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构建更加紧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这表明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紧密度欠缺的问题。而周边命运共同体紧密度欠缺的问题体现在中国与周边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主要包含地缘政治结构、经济竞争结构和话语体系结构问题三个方面。

第一,地缘政治结构问题。所谓地缘政治结构是指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以地理相邻而产生种种结构性问题。根据地理概念,中国陆上相邻国家为 14 个,海上相邻国家为 8 个,共计 22 个国家。这是狭义的周边国家的概念。从广义来讲,美国属于中国的大周边。

从狭义的周边来讲,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历史问题和边界领土争端、岛礁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端等。这些问题或争端都是历史形成的,大都与西方殖民因素相关。虽然中国与这些周边国家建立了处理争端的双边机制,但由于这些争端涉及各国民族自尊和主权申索,因此,短时间难以解决。有时,受某些突发事件的影响,这些争端有可能持续发酵,甚至可能干扰双边合作的友好大局。

从广义的周边来讲,美国是最大的干扰源,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美国特朗普总统推行所谓印太战略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伊始,中美之间的博弈不断加剧。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负面政策,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通过密切伙伴关系、巩固军事联盟等手段努力建立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广泛联盟,在安全、科技、人权、经济等方面重点围堵中国,遏制中国。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sup>②</sup>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美国高官不断访问中国周边国家。在东北亚方向,7 月 18 日至 25 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蒙古国。她以“安全议题”为切入点,试图加强美国与东北亚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合作。在南亚方向,3 月 19 日至 21 日,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印度,美方承诺与印度建立“全面和前瞻性的国防伙伴关系”;7 月 27 日至 28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访问了印度,双方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深化安全伙伴关系。2021 年 12 月,美国国务卿首访印尼和马来西亚,不断渲染南海议题,离间中国与印尼和马来西亚关系。美国高官密集高调访问东北亚和南亚,是尝试在中国周边这两个方向“树篱筑坝”进行围堵布局。此外,2021 年 9 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后,举行了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第一次面对面首脑峰会,拉拢中国周边大国,强化其“印太战略”,意图进一步夯实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基础。同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成立奥库斯联盟,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2021 年 11 月,澳大利亚与美国签署购买 8 艘核潜艇协议,剑指台海和南海。需要认识到,美国这种对中国周边的围堵,不一定奏效,但会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产生一定的破坏性作用。

第二,经济竞争结构问题。在全球和地区价值链与产业链调整、重塑之际,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周边国家产业发展的竞争和挑战。一方面,来自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传统产业强国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区内新兴经济体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日本、韩国工业体系高度多元化,具备从基本商品(如钢铁和纸张)到尖端技术的完整产业链,主导着汽车、电子产品、造船、机器人、半导体制造、光纤、光电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研发和生产。在汽车、造船及电子三大领域,日韩与中国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 1. 中国与日韩汽车、造船及电子产业的竞争

2020 年,日本汽车工业总产量 807 万辆,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位居全球第三位;其中出口 374 万

① 《习近平主持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人民日报》2022 年 1 月 26 日,第 1 版。

② 时殷弘:《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非战略军事阵线》,《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3 页。

辆,北美、欧洲和亚洲为其前三大主要出口地区。<sup>①</sup> 丰田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日产、本田、铃木和马自达也为世界头部汽车制造商。同期,韩国汽车总产量超过 350 万辆,位居全球第五位。2020 年 7 月,韩国政府宣布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作为韩国新政的三大支柱之一,未来五年总投资 73.4 万亿韩元,重点促进汽车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使韩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结构中具有竞争力的领导者。<sup>②</sup> 2020 年,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本土以外生产了约 1 538 万辆汽车,其中约 917 万辆集中在亚洲地区,东南亚的印尼、泰国是其核心市场。<sup>③</sup> 而东南亚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日韩与中国同为全球前五大汽车制造国,市场竞争与产业内竞争趋势明显。

造船业是中日韩竞争的又一产业领域。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信息表明,2021 年 5 月,韩国造船商占当月全球新船订单的 59%,中国造船商占 36%,韩国超过中国重新夺回首位。<sup>④</sup> 但 2021 年上半年,中国造船企业仍以 1 348 万修正总吨(CGT)或 474 艘船的新订单位列第一,占市场份额的 45%;韩国造船商以 42.6% 的市场份额或 1 276 万修正总吨(CGT)紧随其后。<sup>⑤</sup> 根据日本船舶出口商协会提供的数据,2020—2021 年日本造船公司新增总计 890 万总吨(GT)的新船出口订单,同比增长 6%。<sup>⑥</sup> 相较于中韩,日本造船商具有比较成本劣势,但其雄厚的全产业优势以及钢铁产业基础仍维持着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电子芯片产业是中日韩三国竞争的又一大领域。韩国三星、LG 和海力士(SK Hynix)等公司引领了全球电子产品的发展,包括半导体、电视、智能手机、显示器和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与中国产品形成直接竞争。2020 年,韩国芯片制造能力位居全球第一,其中内存芯片(Memory Chips)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35.2%,逻辑芯片(Logic Chips)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8.25%;同期,日本内存芯片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21.7%,逻辑芯片占 8.6%;中国内存芯片全球市场份额不及日韩两国,仅为 19.2%,但是,逻辑芯片却高于日韩达到 19.5%。<sup>⑦</sup> 2021 年 7 月,韩国 ICT 出口连续 14 个月增长,7 月增长 30.2% 至 195 亿美元,其中芯片出口增长 38.8% 至 111 亿美元,连续三个月超过 100 亿美元大关;存储芯片增长 43.8% 至 71 亿美元,系统芯片增长 35.8% 至 33 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月度出口额。<sup>⑧</sup> 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华为及其 5G 通信技术的打压、限制,为包括三星在内的韩国公司以及日本公司赢得更大的全球电信和消费电子设备市场份额。2020 年 9 月,三星与美国电信公司 Verizon 达成一项价值约

① Jap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nc., *The Motor Industry of Japan 2021*, Tokyo: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JAMA, October 2021, pp. 4–8.

② Doyeon Lee and Keunhwan Kim, A Collaborative Trans-Regional R&D Strategy for the South Korea Green New Deal to Achieve Future Mobility, *Sustainability*, Vol. 13, No. 15, August 2021, p. 2.

③ Gorka D., Japanese Automakers' Overseas Car Production Volume 2011–2020, July 16,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58861/japan-overseas-automobile-production/>.

④ Nam Kwang-sik, S. Korea remains No. 1 spot in May shipbuilding orders, June 10, 2021,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10610004200320>.

⑤ The Maritime Executive, China and South Korea Both Claim Leadership in Shipbuilding, August 11, 2021, <https://www.maritime-executive.com/article/china-and-south-korea-both-claim-leadership-in-shipbuilding>.

⑥ Rieko Suda, Japanese shipbuilding orders rebound in 2020–21, April 9, 2021, <https://www.argusmedia.com/ru/news/2203664-japanese-shipbuilding-orders-rebound-in-202021>.

⑦ Sohee Kim and Sam Kim, Korea Unveils \$450 Billion Push for Global Chipmaking Crown, May 13,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5-13/korea-unveils-450-billion-push-to-seize-global-chipmaking-crown>.

⑧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Korea's ICT exports advance for 14 straight months, up 30.2% to \$19.5 billion in July, August 12, 2021, [http://english.motie.go.kr/en/tp/alltopiccs/bbs/bbsView.do?bbs\\_seq\\_n=866&bbs\\_cd\\_n=2&view\\_type\\_v=TOPIC&&currentPage=1&search\\_key\\_n=&search\\_val\\_v=&cate\\_n=](http://english.motie.go.kr/en/tp/alltopiccs/bbs/bbsView.do?bbs_seq_n=866&bbs_cd_n=2&view_type_v=TOPIC&&currentPage=1&search_key_n=&search_val_v=&cate_n=)



66 亿美元的五年期交易,为其提供 5G 无线解决方案。<sup>①</sup>

日本政府通过实施“社会 5.0”战略,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推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融合,确保日本在机器人和工厂自动化系统的生产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韩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斥资约 4 500 亿美元建设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基地,加入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竞争,争夺主导关键技术。根据发展规划,三星将在 2030 年之前将其支出增加 30% 至 1 510 亿美元,海力士(SK Hynix)除了 1 060 亿美元的龙仁四家新工厂计划外,还承诺投资 970 亿美元用于现有设施的扩张。韩国政府寻求在首尔以南数十公里处建立一条“K-半导体带”,将芯片设计者、制造商和供应商整合聚集发展;同时加大力度吸引海外投资,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ASML Holdings NV 计划斥资 2 400 亿韩元在华城建立一个培训中心,而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 Lam Research Corp 计划将其在韩国的产能翻一番;2022—2031 年,韩国计划培养 3.6 万名芯片专家,并开始讨论为协助半导体行业量身定制立法。<sup>②</sup>

此外,中日韩三国在海外建筑承包、海外并购、旅游业、生物技术、医疗保健、娱乐产业、现代服务贸易产业等领域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 2. 中印 IT 产业的竞争

除了需要面对“老牌劲旅”日韩的产业发展压力,中国还面临本地区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市场的挑战。2020 年印度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其经济结构与产业发展阶段、水平与中国存在同质性或相似性,因此,常被视为中国的“天然对手”。从产业优势看,印度 IT 产业与中国存在明显竞争。目前,印度是全球第一大软件外包目的国,也是全球领先的采购目的地,约占全球服务采购业务 55% 的市场份额,中国紧随其后位列第二。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数据表明,2021 财年上半年,印度 IT 和商业服务行业营收约 6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6.4%;2021 财年 IT 行业出口收入预计达 1 500 亿美元,其中软件服务出口预计增长 4% 达 1 337 亿美元;截至 2021 财年,IT-BPM(信息技术—业务流程管理)员工总数超过 450 万;垂直领域拥有 60.8 万名云专家,排名全球第三;IT 核心竞争力和产业优势吸引了全球投资,2000 年 4 月至 2021 年 6 月,印度计算机软件和硬件行业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741.2 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外资流入领域;2025 年,印度 IT 和商业服务市场收入将达到 199.3 亿美元。<sup>③</sup>

全球制造组织现在面临三个层次的依赖,即中国的实物商品、印度的传统 IT 服务和美国的云计算巨头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印度 TCS、Infosys、Wipro、HCL、Cognizant 等本土 IT 巨头通过云迁移、业务分析、流程自动化、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物联网和其他形式的“数字化转型”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埃森哲、IBM、德勤、DXC 和其他在印度开展大量实际工作的西方公司直接或间接采购其服务。美国私营部门行业以不同的方式依赖印度 IT 服务。印度在 IT 领域没有遵循亚洲模式,即主要在研究和创新的高端以及价值链上游竞争。中美技术领域的“脱钩”,为印度创造了契机。莫迪政府计划将制造业与其先进的数字能力相结合,以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创新,并优先发展制药和生物技术。

印度热衷于通过巩固其当前的制造实力并为未来的增长市场定位,吸引迁出中国的制造商。通过全球市场出口扭转其长期以来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推动包括化学品、制药、塑料、纺织品、服装和

① Dee - Ann Durbin, Samsung wins \$ 6.6 billion Verizon contract for 5G network, September 8, 2020, <https://apnews.com/article/technology-europe-business-50e406d41d782a1bcbe2596bd6ecf4be>.

② Sohee Kim and Sam Kim, Korea Unveils \$ 450 Billion Push for Global Chipmaking Crown, May 13,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5-13/korea-unveils-450-billion-push-to-seize-global-chipmaking-crown>.

③ India Brand Equality Foundation, IT&BPM Industry in India, December 17, 2021, <https://www.ibef.org/industry/information-technology-india.aspx>.

钢铁在内的制造业发展。印度未来产业清单包括手机、半导体、医疗设备和用品、汽车零部件、电池、电信设备、食品、白色家电、纺织品、国防生产、电子产品、太阳能电池板,以及最近的玩具产业,与中国制造业形成直接竞争。

### 3. 中越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越南被认为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不断完善的营商环境、庞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促使其成为中国之外寻求降低成本和供应链多元化的理想投资地点。由于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南的供应链不断发展并形成与中国直接竞争的态势,最典型的是纺织及成衣产业。近年来,越南外国投资从主要的裁剪—制作—修剪(CMT)模式转向上游行业,如面料生产和染色。越南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越南服装纺织业出口创汇390亿美元,同比增长8.3%,出口额占GDP总额的16%,2014—2019年,越南纺织业年增长率达17%。<sup>①</sup>2020年,越南超过孟加拉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服装和纺织品出口第二大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越南纺织业形成了上中下游完整的产业链,即上游纤维生产、中游织物生产和染色以及下游服装制造,并发展出成熟的裁剪—车缝—辅料(cut—make—trim)全过程加工模式。

目前,越南已同56个国家、地区和经济体签署了15个自由贸易协定,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2年1月开始生效,越南15个自由贸易协定均已正式生效并实施。越南依托东盟框架建立了面向亚太地区的FTA网络,并逐步拓展至全球FTA网络,尤其是2020年8月1日生效的越南与东盟自贸协定(EVFTA)、2021年5月1日正式生效的越南与英国自贸协定(UKVFTA)为外资企业开拓欧洲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从2019年开始,越南纺织服装协会(VITAS)敦促纺织和服装行业的企业为EVFTA做好准备并进军欧洲市场。EVFTA生效后,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到欧盟的关税将减少42.5%。<sup>②</sup>优惠的关税税率、多重自贸协定利好成为越南与中国在纺织、成衣、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竞争的显性优势。

第三,话语体系结构问题。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sup>③</sup>虽然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依然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周边国家中,虽然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却一直以来因西方媒体的“标签化”和“污名化”而常常陷于负面的刻板印象。近段时间以来,不论是在近些年发生的中美贸易战、香港修例风波,还是突如其来的新疆议题上,中国形象在周边国家的输出效果显然并不令人满意。这与西方国家长期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已然形成的话语霸权不无相关。

#### 1. 话语霸权与西方价值观

国际话语权是国际行为体通过交往所呈现的自身观点、立场、思想乃至情感、态度等话语行为所具备的影响力,与自身利益以及承担的责任、义务相关,也关联到自身在“共同体”内部与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受语境、传播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话语权即是行为体软实力的重要组成,亦与硬实

① Trinh Nguyen, Seiz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Vietnam's Garment and Textile Industry, August 7, 2020, <https://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seizing-investment-opportunities-vietnams-textile-garment-industry.html/>.

② 《让企业从EVFTA中获利》,越南人民报网(中文版),2020年2月14日,见 <https://cn.nhandan.vn/economic/item/7616501-%E8%AE%A9%E4%BC%81%E4%B8%9A%E4%BB%8Eevfta%E4%B8%AD%E8%8E%B7%E5%88%A9.html>.

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力的分配状况高度一致,并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伦理等因素的制约。<sup>①</sup>而国际话语霸权则意味着依仗话语的优势地位,垄断国际议题的设置权和议程的主导权,垄断国际事务是非优劣的评判权,垄断国际格局的塑造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国际争议的裁量权。<sup>②</sup>

二战结束之后,美英等西方国家利用殖民地政府影响力或者战后占领积极建立西方文化传播网络。中国周边国家几乎都以西方话语与价值观填充教育与传媒领域。以日本为例。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占领了7年两个月。在此期间,美国主要是通过一种软实力对日本进行改造,对日本的所有媒体都进行管制。借助殖民或战争优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着国际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已然形成话语霸权。这些话语霸权体现在议题设置、传播辐射、理念引领等方面,向世界各国输出一系列“西方中心主义”的规则和理念,并利用这些优势地位对“异己者”予以排斥和攻击。

概言之,西方话语霸权在中国周边国家形成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从而阻断了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中国价值、中国叙事与中国精神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政经界萌芽的“中国威胁论”即被西方媒体传播造势。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轮番在中国周边国家中传播。而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推进,西方媒体更将中国塑造为“债权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主体。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西方媒体将中国的疫情防控手段塑造为违反人权的范式,并积极推动病毒溯源。在2021年的新疆问题上,西方媒体还通过对特定事件的歪曲报道进一步丑化中国的国家形象,比如编造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谎言,给新疆棉花贴上“强迫劳动”的标签。从本质上而言,西方国家媒体对中国污名化的主要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以保持他们在世界各国的优势地位。<sup>③</sup>

## 2. 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的媒介平台控制

话语霸权的前提是对广泛的媒介平台的控制。西方国家早已在这些周边国家布局了强大的新闻传播体系。对于大多数周边国家而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路透社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接收国际新闻的主要媒介。这些媒体不仅通过设立代表处、记者站等形式建立联系,还建立本土化的新闻网络。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印尼的本土化为例,2014年,CNN在印尼专门建立了CNN印尼频道,以印尼语为播报语言,拥有逾700名记者、编辑和制片人,<sup>④</sup>除在首都雅加达设立主运营基地以外,还在6个城市设立了远程分社,影响力可见一斑。<sup>⑤</sup>

这些传媒“基础设施”成为了西方软实力传播的基础,即使是负责外宣的中国媒体,也不得不依赖这些西方传媒获取信息源头。以路透社为例,在新疆问题上,路透社已经完全成为了西方反华势力的传声筒。但中国媒体离不开路透社,依赖路透社购买稿子和信息。在当前环境下,中国的媒体还没有资金和能力在国外去铺设足够的记者站。除传统的电视台、新闻网以外,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西方国家传播其价值观的重要领地。脸书、推特、Instagram等社交媒体成为中国之外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接收信息的主要媒介。<sup>⑥</sup>以脸书在东南亚国家的用户数为例,截至2021年6月,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脸书用户均超过了总人口的80%,越南、柬埔寨的脸书用户则超过了总人口

① 孙英春:《全球伦理与国际话语权》,《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2018年第2期,第28页。

② 陈曙光:《政治话语的西方霸权:生成与解构》,《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37页。

③ 倪雪:《法治视域下新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第47—52页。

④ 参见 CNN Indonesia Details, <https://www.apollo.io/companies/CNN-Indonesia/5f4976c368c91e000138c659?chart=count>。

⑤ Michael Balderston, Avid Everywhere Boosts CNN Indonesia Production, Tvtech, December 02, 2015, <https://www.tvtechnology.com/news/avid-everywhere-boosts-cnn-indonesia-production>。

⑥ 李怀亮:《西方话语霸权的消解与中国软实力的系统性构建》,《对外传播》2018年第7期,第40—42页。

的70%,印尼的脸书用户率也达到了76.8%,而文莱甚至基本达到了全民使用脸书的程度。<sup>①</sup> 这些社交媒体通过对用户言论的管控排除异己,进一步维护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

### 三、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人文交流路径探索:目标与路径

从政策层面看,既往学界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实践性建议还存在过分关注物质层面行动,对以人文交流为核心的非物质性实践路径关注不足。既往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均对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大都停留在表面上,深度有待于挖掘。对于中国而言,大力推进同周边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既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也是塑造长期总体利我周边战略环境的有效手段。<sup>②</sup> 如何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更好推进人文交流,换言之何种人文交流能够更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需要解决人文交流在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问题。

#### (一) 目标定位

根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及要求,设立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目标。这个目标既是宏观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应具有可操作性的阶段性目标。战略目标的设定需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阶段性目标的设定则需要解决阶段性任务。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标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契合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特点,与中国和周边国家合作发展的历史脉络一致,具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首先,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低目标。没有和平稳定,其他一切的合作发展都是空谈。其次,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与繁荣格局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次级目标。共同发展与繁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诉求,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的根基。再次,中国与周边国家陆地、海上相连,双方命运唇齿相依,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则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较高目标。最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历史悠久,文化相似、理念相通,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高目标。<sup>③</sup>

基于上述宏观目标,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宏观目标定位于开创新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新局面,深化与稳定周边国家关系,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夯实根基,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与互利共赢。

同时,前文所述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的两大现实挑战,即认知困境和结构矛盾,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和紧密度欠缺密切相关。破解上述两大现实挑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阶段性目标。

鉴于此,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阶段性目标定位为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密切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民意与社会基础。具体来说,基于人文交流自身发展规律,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需要树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需要夯实中国在周边的社会基础;需要建立中国在周边的话语体系。

#### (二) 路径选择

推动人文交流拥有多条路径,每一条路径都有其功能和特点。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需

① 数据来源:<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3.html>。

② 王俊生:《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概念、内涵、路径》。

③ 邢广程:《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当代世界》2021年第8期,第10—15页。

要对人文交流的路径进行精准定位,使得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更加有序、有力,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首先,建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统筹机制。周边国家人文交流覆盖面广,牵涉职能部门较多,需要成立跨部门协调小组,统筹人文交流各个领域工作。在机制、领域、项目等方面,建立和发挥统筹作用,引导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路径向有序、有力方向发展。

一是发挥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引领作用。迄今为止,中国与俄罗斯、印尼、印度和日本等周边国家建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这些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为副总理级,分别为双方的副总理级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或文化教育负责人牵头,对相关人文交流领域进行协调、统筹,一般轮流在双方召开年度机制会议。在这一机制框架下,需要建立更多的人文交流品牌项目,为其他人文交流项目做好示范,充分发挥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引领作用。<sup>①</sup>

二是需要做到“重点突出”。周边国家国情千差万别,可调动资源相对有限,需要加强重点领域突破,视情对一些国家重点推进教育交流、青年交流和科技交流,对于一些国家重点推进媒体和旅游交流,深化民心相通工作。比如针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要共同面对极端主义威胁,应重点推进青年交流;针对印尼、马来西亚等中等发展中国家,应重点推进教育交流和科技交流,深化利益融合点;针对印度、缅甸等国家,应重点推进媒体和旅游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三是需要做到“相互配合”。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涉及的诸多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比如,推进周边国家的教育交流,需要科技和青年交流的配合与协调;推进旅游交流则需要文化交流注入实质内涵,媒体交流搭建传播平台。比如通过“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多边场合,将科技交流与教育交流、文化交流和旅游交流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中国周边国家人文交流。

四是需要做到“有序推进”。周边国家人文交流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润物细无声;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服务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计划的人文外交中长期规划。做到“有序推进”,需要深刻了解周边国家人文交流面临的复杂环境,厘清先后次序,重点领域,然后做好5—10年的中长期规划。

总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统筹机制需要协调各个机制的长板与短板;针对不同目标,重点推进相关领域交流与合作;以项目为抓手,循序渐进,完成各个领域阶段性目标。

其次,多渠道深化周边国家人文交流。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涵盖媒体、青年、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领域。各个领域具有不同特点和优势。需要充分发挥各个领域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提升人文交流在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辐射力、塑造力、引导力与向心力。

一是提升媒体交流的辐射力。媒体是传播信息、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他国人民生活状况的重要窗口,也是周边国家人民对中国认知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媒体的交流是减少双方认知上差异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人文交流的重要抓手,其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扩大我在周边国家的话语权是重要内容之一。

二是激发青年交流的积极性。青年是各国人民的未来,也是人文交流的主体之一。由于青年人思想活跃、精力充沛,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交流,能够更加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添不少活力。青年夏令营、青年大联欢、青年创业论坛等都是青年交流的有效形式。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青年交流的潜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今后应多扩大青年交流的规模,与此同时还要在交流的内容上多下功夫,开展更多点对点的有针对性的交流。<sup>②</sup>

三是发挥文化交流的感召力。文化交流是人文交流的核心,也是人文交流的动力与源泉。一般来说,文化交流产生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质文化之间,相互之间产生碰撞或吸收。而异质文化之

①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2日。

② 许利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新视野》2014年第5期,第120页。

间,往往会产生势差,各个文化主体之间必须拥有强大的文化自主权,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能产生文化交流。<sup>①</sup>可以通过文物修复合作、博物馆合作等形式,让传统文化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更多地走入普通老百姓的视野之中,增强周边国家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信,从而增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内涵。

四是促进教育交流的塑造力。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培育人文修养、传承人文精神和人民力量的重要途径。从教育的层次来说,教育交流包含高等教育交流、中等教育交流、初级教育交流和学前教育交流。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教育交流还侧重在高等教育的交流,而其他层次的教育交流在逐步增加和完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语言教学、互派留学生、合作办学、校长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外在中等职业教育交流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在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比如中方接受对方派遣的学生培训,或中方派遣教师去对方学校授课等。<sup>②</sup>

五是推动科技交流的吸引力。科技交流与合作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与周边沟通的重要渠道,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政府及民间渠道,加强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重要路径。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引进、消化、吸收周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并创造出适应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航天技术、生物技术、医药技术等方面开展了交流与合作,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六是加强体育交流的向心力。体育可分为大众体育、专业体育、学校体育等类,包括体育文化、体育教育、体育活动、体育竞赛、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国家间体育交流往往对国际关系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举办,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局面。比如在亚运会举办前夕,中国与印尼的复交,推动了中国与文莱、新加坡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打开了中国通向东南亚的新通道。

七是深化卫生交流的凝聚力。卫生交流是推动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抓手。深化卫生交流能够在危机时刻,更加凝聚周边国家人心,增强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次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彰显了卫生交流的必要性的重要性,凸显了深化卫生交流的紧迫性。卫生交流涵盖面较广,包括合作机制建设、大型传染疾病防控、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卫生应急与紧急医疗援助、传统医药、卫生体制与政策、卫生发展援助、卫生健康产业发展等领域。这些领域相互关联,推进过程中,更多以项目合作形式,注重项目的可持续性。<sup>③</sup>

此外,环境交流、地方交流、智库交流等人文交流路径对于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了解与认知,促进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四、结语: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展望与政策建议

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强大传播能力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关键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国际传播的方向,要讲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讲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更要讲“七大观念”,即中国的发展观、中国的文明观、中国的安全观、中国的人权观、中国的生态观、中国的国际治理观、中国的全球治理观。针对当前周边国家的舆论环境,中国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借助人文交流的路径,有针对性地推进国际传播,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塑造中国良好的对外形象、

① 刘京辉:《中外人文交流的使命与历程——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10页。

② 许利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

③ 赵磊、王冰:《全球卫生外交的特征与中国实践》,《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5期,第42—55页。

提升中国的对外声誉和国际影响力,为加快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观念基础和认同价值资源。

第一,在开展国际传播时,必须牢记中外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同时缩小中外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应该坚持四个自信,主动积极地讲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应该使用容易被外界接受的话语,使中国发出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接受。在周边国家经营中国的国际形象应特别注重本地的传统文化以及与中国的历史往来,将“民心互通”、民间交往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主要方式。在这些国家中的中资企业,应主动在当地话语体系中寻找认识与理解中国的符号与故事,从而发挥舆论前线的作用。<sup>①</sup>

第二,发挥中国自己的媒介平台优势。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有着广泛的海外联系,具有“传声筒”的作用。在当前西方“有色眼镜”的支配下,周边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中国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甚至根本不相信。由此,有必要寻找一个能被外界接受的“传声筒”。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与特区政府合作,设立一个面向全球的媒体中心。此外,东南亚地区广泛存在的华人华侨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媒介传播优势。一些周边国家存在本地的华人报纸,是中国在国际舆论战中的天然盟友,是中国故事本地化的重要媒介。

第三,注意中国传播方案的本地化。在推进国际传播时,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中国价值与中国方案的普适性;另一方面,应注重中国方案的本地化、本土化。例如,应当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讲清楚中国七千多万人成功脱贫的历史功绩与会给其他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方面带来什么?会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什么?或者更直接的说,可以给国外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对于中等发达程度以下的国家具有什么样实践的意义?对于“一带一路”上的沿线国家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

第四,注意到“小骂大帮忙”者的存在,不能只谈成就不谈问题,树立立体中国国家形象。针对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应从保守到主动,必要时刻反守为攻。同时要注意自己主动给普通民众打舆论“疫苗”,加强“污名抵抗力”。这就要求在国际传播时,既要开诚布公地讲成绩,也要从容不迫地谈问题。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而应对这些问题所积累的经验正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智慧。

总而言之,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是中国维护、延长和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依托。在此背景下,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同时,周边又是一个文化多姿多彩、政治复杂多变、经济参差不齐的地区。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无疑会面临诸多挑战。相较于物质层面的交往合作,人文交流在增进国家间观念认同、提升战略互信水平、夯实国家间交往的民意基础、促进繁荣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着“软联通”的独特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同有关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过程中,由于价值观念、身份定位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短期内难以弥合,往往会产生一系列不必要的摩擦甚至冲突。在此过程中,人文交流的同步推进将发挥有益的“润滑剂”作用,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双边政策误解误判、为务实合作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王丰年)

<sup>①</sup> 潘晔、肖陈望:《“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意蕴与实施方略》,《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7期,第33—37页。

## ABSTRACTS

### **Contract as a Deed and Constitutional Contract: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tract**

Ren Jiantao

It is no doubt that ancient China had a mature contrac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racts, people usually conclude that China has a tradition of social contract, which is a miscalculation. Both the ancient folk contracts and the deeds elaborated by the thinkers were limited to regard the contracts as the deed, which meant they were made to ensure cooperation because of habitats. There are neither social contracts, nor contracts in the sense of the political contract theory. Therefore, there is no way of transforming from contract as a deed to a constitutional contract. According to it, unless the extended order guides the direction, this change occurs in a spontaneous order. It is a great transition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ity. Traditional Chinese contract system is not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which is generally a sporadic non-political behavior. To construct a constitutional contract, China needs to refresh the system. In conclusion, it is encouraging to find the resources of contract idea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the tradition. However,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derive a constitutional contract directly from the tradition.

###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ory, Reality and the Path Exploration of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Xu Liping

Building up a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the goal of China's neighborhood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In terms of building up a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in China's neighborhood, domestic academia has conducted active discussions in regard to its origin of thoughts, indication, significance and path.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that exist in issues concerning its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 and too much emphasis has been addressed on the material level in relevant literature.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and combined with relevant theor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faced with double deep-seated problems, namely, weak consciousness and lack of closeness, both of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identity dilemma and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speaking, on the one hand, the difference of identities, diversity of value cognition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lead to the weak consciousness in recognizing the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queeze of geopolitical structure, the impact of competitive economic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distor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uttering voices caused the loosening configura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nature. This article insists that, to 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China needs to actively readjust its role in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by establishing a holistic mechanism for cultural exchanges, in order to deepe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a multi-level manner. Besides, China also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right to speak, with the hope of enabling



the full potential of cultural exchanges in building up the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Female Gaze and Femininity in Art**

Zhou Xian

A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the history of feminist art is: why are there no great women artists? French female artist Vigée Le Brun (1775 – 1842) could be one of the best case studies for the question. Her great portraits (including self-portraits) prompt us to explore the female gaze and femininity in art histo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er self-portraits rather than her successful portraits. Because self-portrait is a genre with more visual self-reflexivity by which we can examine deeply the issues of women painters, female space in the studio, and maternal artistic expression. Vigée Le Brun’s successful case shows that the emergence of great female artists must be the result of women’s struggle against gender inequality.

**Restatement: The Ontological Existence of Classical Chinese Opera**

Zhu Xiajun

In classical Chinese opera, the existing stori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the restatement resources of opera script writing, and the restatement relationship of “double performance” with genre masters formed by singing, reading and acting out the story, and the “empty stage” on which the stage is generally restated as one table and two chairs are the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opera restatement art. Conventiona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lassical opera performance, is established and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restatement. Constant restatement and only restatement can build a meaningful fixed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ers and actors, between actors and audiences and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 It is precisely with the help of the metonymic, symbolic and arbit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tatement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nd their transmitted meaning that the “freehand brushwork” of classical Chinese oper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realist drama. The restate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has deeper reasons, such as the psychological reprod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 pursuit of “ultimate vers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sition in tradition. Restatement has essentially become the ontological existence of classical Chinese opera writing and stage performance.

**Restudy of “Confucius Is Sheng of Shi” and “Women of Shi” in *Zhuangzi***

Xie Zhixi

Many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us as Sheng of Shi (圣之时)” in Mencius and “Woman of Shi (时女)” in *Zhuangzi* are not appropriate, and even misinterpret the semantic relationship of the original work. We should combine the exegetic and hermeneutic methods to make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In fact, the two words “Shi (时)” refer to how to wait for the time when the sage is unlucky or the woman is not married.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academic history teach us that when studying classical literature,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rigorous and solid exegetic training,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get out of the limitations of explaining words in isolation. We should strive to seek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 in a broader text-humanistic context and more integrated reading interaction.

**A Re-examination of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Sanqu**

Zhao Yishan, Li Tao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Sanqu (literally “dispersed songs”散曲), there are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that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such as the debate